责编：龚克　E-mail:gongke@ccps.gov.cn　Tel:010—62806124　　2014年10月13日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创新

□敖带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总体上实现了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转变，这一系列转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在政治上体现为由掌权的组织需要和理论偏好转变到顺应执政规律、体现党内民主、扩大政治参与等执政路径上来；在经济上体现为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实现科学发展；在文化上体现为由注重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转变到承认文化的双重属性、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在社会方面体现为用“社会治理”替代单纯的“社会管理”，以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来实现社会有序运转。

执政话语体系创新服务于国家政权建设，它为国家的政治主张进行论证和说明，并以规范醒目的语言表述国家的政治意图和方向，使人们建立起对执政权威和政治秩序的认可，借此引导思想舆论，整合分散的力量，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

赋予执政话语体系亲和力

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党的执政理论要能够及时反馈民意、充分体恤民情、广泛集中民智、合理配置民力。只有凝集民心，才能整合社会力量，减少执政的阻力和风险。这实际上对执政话语的表达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执政话语的表达必须要具有亲和力和向心力。亲和力表明执政话语有受众，受众愿意听，这点是简单的灌输所不能达到的；向心力表明执政话语有影响，受众愿意以执政话语为理论武器，自觉抵制和排斥异质信仰，敢于和错误的思想倾向作斗争。

文化形象的亲和力是执政话语的外衣。在不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庄重性的同时，执政话语的叙述方式应该尽量贴近大众生活，使用民间话语，具有平民风格。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会议期间，就以极具亲和力的话语强调：“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随后我们又聆听到他一系列的通俗易懂的执政话语，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苍蝇老虎一起打”，“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等等。清晰地展示了新一届党中央的执政理念和话语风格，也符合当下社会话语潮流和交往趋势。

只有改变过去那种生硬呆板的叙述方式和居高临下的说教口吻，才能让执政话语具有亲和力。即使是真理，如果被拙劣的表达所包裹，也会失去应有的锋芒。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套话盛行、空话连篇，更不能成为假大空的别名。我们不能让公式化、口号化、命令化的传统话语弊病破坏了执政话语的文化形象。37年来我国执政话语表达方式创新的实践充分说明：只有用亲切的表达才能唱响主旋律，用生动的话语系统才能阐述真理、巩固效果。

执政话语要合理解释社会的变化

党的执政话语体系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具有总体性的认知范式作用。它通过一整套特定的话语体系和观念综合来表明我国政治主张和制度设计，从而告诉人们该信仰什么、追求什么、抵御什么，自我进行很好的自律，约束不当行为，遵守社会规范，使个人和社会、基层和中央、下级和上级良性互动，戮力向前。

党的执政话语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是一种思想规划，它为社会提供一套认知范式，解释社会变化。同时，它又具有排斥异质信仰的作用，由精神力量转变为物质力量，这有助于促进群体内部的价值认同和意志整合，保持社会群体内部的团结和稳定。越是在社会转型的时代，执政党肩负的任务越重，就越要强化意识形态及执政话语体系的创新，从而为社会的巨大变化提供合理的说明。

党的执政话语作为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形成以后，其维持的过程也是执政党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由于执政党需要获得群众可持续的思想认可和政治支持，因此，执政理论的论证不会是一劳永逸的，这也使得执政话语表达方式的创新必定是永恒的。主观上执政党政治目标的更替和政治任务的重新设定，客观上执政时空领域的变化，都会导致执政环境的改变，并最终使执政话语发生变化。尽管执政理论的核心内容没有变化，但是执政话语是极为敏感的，它就像社会的神经，牵一发而动全身，哪怕是微小的调整，也会引起社会思想的波动。如果不能注意到意识形态的这种变化规律，就有可能在无形中产生思想障碍，流失执政资源，使持续执政陷于被动。

先进的意识形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文化引擎，而只有成功地解释社会可观察到的变化的同时保持适度的灵活性和兼容性，才能够与时俱进地实现自我更新的意识形态，才称得上是先进的意识形态。提高意识形态的社会解释力是执政话语表达方式创新的基本动力。执政话语是否能够获得受众的持续忠诚，除了执政话语本身的合理性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执政话语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力度。成功的执政话语总是能够保持合理的张力，解释社会现状，预测发展趋势，作为一种全面的知识体系为人们所接受。要做到这一点，执政话语就应该兼收并蓄，在实践上和空间上变得更加圆润，并且能够突破一定群体或阶层的局限性，在具备思想上的系统性和抽象性之外，还要具有适度的灵活性，以保证及时更新。

通过执政话语创新 争取受众促进社会认同

执政话语作为统治者提供给社会的思想产品，和一般的精神产品不一样。一般的精神产品具有市场性、消费群体性、趋利性等特征，而执政话语是一种免费的公共产品，不以追求市场利润为目的。它的公共性在于它能够跨越不同社会阶层，涵盖尽量多的社会群体。执政话语作为一种公共精神产品，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总量递增。执政党在提出一个执政话语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地涵盖和整合更多的社会群体，但是社会群体对执政话语有一个遴选和甄别。执政话语一旦形成以后，就无法排除公众对它的消费和品头论足。公众进行执政话语的“消费”是非排他性的，它的总量不因消费者的增多而减少，消费者越多，说明对这种执政话语的认同者越多，这就越能强化这种执政话语，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即使额外增加一个消费者也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任何增加，消费者数量的增加所引起的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第二，排他供给。执政话语这种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在一个特定的政权时代只有一个，这个权威的供给方不仅自己负有设计产品的任务，而且还要抵御和打击和它对立的产品，减少对立产品对本社会成员的影响。执政话语这种公共产品永远处于供方主导地位，供需状态一般是平衡的。一旦供需出现矛盾，可能就是思想革命甚至是社会变革的前兆。

一个国家和政党投资执政话语这种公共产品，并不是没有收益的。恰恰相反，收益极高，它减少了上下层的观念摩擦以及群众因思想冲突导致的社会能量的损失，使政治决策过程和运作过程简单明了。

社会主义执政话语已经从过去的封闭、对抗的环境条件下走出来，跳出了非此即彼的传统思维模式，适应了世界的发展变化。在和西方社会全面竞争、深度合作、长期共存的环境中，保持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开放状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开发执政话语促进认同凝聚社会的功能方面，我们已经初步取得了三条经验：第一，在社会思想建设中，我们已经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搞政治运动来统率社会思想、以政治动员为基本源动力的意识形态建设格局，注重到了资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变化，承认人们的思想异动，主动寻找思想变化背后的深刻原因，为观念整合找到了能够为各方接受的理论中轴线，并通过执政话语来反映这些变化，这样就使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能够顺利进行。第二，从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长官命令的方式来维护意识形态的权威的传统做法中解脱出来，不以整人作为统一社会思想的手段，以和风细雨的细致工作代替“灵魂深处的革命”，强调思想问题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并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发展中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第三，努力突破平均主义的传统价值体系，重视利益差别，承认市场差异，照顾多数，鼓励先进，在开放的过程中弥补差距，适时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在社会竞争和多样化发展中巩固改革成果，赋予社会主义执政话语以时代特征。

> 执政话语体系创新服务于国家政权建设，它为国家的政治主张进行论证和说明，并以规范醒目的语言表述国家的政治意图和方向，使人们建立起对执政权威和政治秩序的认可，借此引导思想舆论，整合分散的力量，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
>
> 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创新，既要赋予执政话语体系亲和力，又要合理解释社会的变化，由此，才能争取受众，促进社会认同。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征文选登

新时期论坛

作风建设的经济意义

□刘忠和

习近平同志强调，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是要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作风建设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党的建设所必需，也对经济建设有着极大的意义和作用；不仅有利于解决中国现存的一些经济问题，更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解决“形式主义”有利于克服盲目建设和低水平建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效率和效益

形式主义的表现形式是追求形式、不重实效，图虚名、务虚功、工作不抓落实，其经济表现就是只图表面花里胡哨，不注重内容和实效，看起来轰轰烈烈，实际上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浪费了时间和人力物力，损害了市场竞争力。当前需要解决的存在于政府行为之中的形式主义，纵容了一些项目匆忙上马，盲目建设和低水平重复，唯GDP论，而老百姓没有得到实际好处。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能够俯下身子、深入群众，切实了解掌握群众需求，关心群众冷暖，在经济发展中把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要彻底解决面子工程、政绩工程问题，破除官商勾结，引导更多的人去研究“市场”而不是去琢磨“市长”；让投资者把资金踏踏实实用在实业经济上，耐心地用心地经营那些有前景有潜力的产业，减少投机行为，从而把更多的人引导到通过技术创新来获得超额利润，通过创新驱动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使整个经济发展走向健康持续的发展轨道，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解决“官僚主义”有利于政府准确定位，正确行使职能，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

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办事推诿扯皮多，效率低下，不作为、不负责任，其经济表现就是忽视时间成本和经济效率，不适当地行使权力，致使经济当事人成本增加、机会丧失。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定位逐渐清晰明确，服务型政府定位已成共识。多年来，各级政府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门难进、事难办的不正常现象，甚至故意推诿扯皮，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以期从中寻得好处。只有解决“官僚主义”，才能真正做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其特殊性，但政府与市场也必定有其边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十分清晰。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必须做好，这样政府和市场之间才能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官僚主义”的存在无疑干扰了这种分工，导致行为扭曲，带来一系列失当的经济行为和后果。经济行为人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跑关系、挖门子上，而不是用在学技术、搞创新上，导致市场上产品升级、技术升级困难，低端产品多、高附加值产品少，市场竞争力不够，尤其在国际市场上长期处于产业链条的上游，经济结构长期不合理。由此，我们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就是反对主张市场决定一切的论调；我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是反对政府行为的扭曲，主张把政府职能发挥好；我们反对腐败，就是要铲断权力和资本勾结的利益链条。

解决“享乐主义”有利于提高风险意识和创新水平，有效引导资源配置

享乐主义是一些领导干部安于现状、贪图安逸，缺乏忧患意识和创新精神，其经济表现就是职业无风险、铁饭碗，不需要风险意识和创新能力。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市场经济中，没有任何一种职业和分工是没有风险的。伴随着风险和机会成本的变化，是资源的流动配置。在我国存在着一种不正常的职业现象：大量的高素质人才来挤“公务员”这个独木桥，市场上却缺乏大量的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原因之一就是公务员职业的曾经无风险、低成本、高收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创新驱动，而创新驱动首先必须有大量的创新型人才来支撑、来保证。解决“享乐主义”有利于把公务员职业风险回归到正常水平，使其在众多的职业分工中定位准确，不该他们享受的就不要存在，没有“职务消费”，他们角色发挥得好坏与否由市场和群众来评价。这样有利于重新洗牌公务员队伍，让那些有创新能力、有市场开拓精神的人回归到市场中，让那些留在公务员队伍中的人倍加珍惜岗位、尽职尽责。更重要的是，给市场释放这样一个讯息：公务员职业有风险、有约束、有纪律，收入不高、要求不少。进而引导更多更优秀的创新人才在市场上打拼，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和科技领军人物。解决“享乐主义”的经济意义就是引导市场人才资源的有效配置。

解决“奢靡之风”有利于树立成本意识，养成勤俭节约习惯，引导正当正常消费，调整经济结构，保证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

奢靡者习惯于大手大脚、铺张浪费，其经济表现就是不计成本、贪图享受，不利于身心健康和生态文明建设。一些官员，在灯红酒绿中迷失了自我，攀比消费，暴殄天物，造成浪费。追求幸福生活是人们的向往，但是幸福生活不等于过量过度消费。我们应该寻找最佳的消费方式适度消费。与过度消费相比较，适度消费以节俭为特征，以朴素稳定的生活为基本内容，以人格纯净和人的全面发展为追求的目标，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基本原则，以精神上宁静、和谐、快乐的幸福观为人生指导思想。同时，人类的消费模式是影响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提倡有利于环境的消费模式即绿色消费。提倡绿色消费，才能保护环境，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绿色消费有三层含义：一是倡导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二是在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和生活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节约资源和能源，实现可持续消费。三是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不造成环境污染。绿色消费是绿色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从“绿色消费”开始，通过“绿色市场”，推动对“生态技术”的需求，以及“绿色生产”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化”的变革。显然，解决“奢靡之风”的经济意义更为深远，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保证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

坚持用系统化思维推进环保工作

（上接第1版）

用系统化思维推进环境保护工作必须统筹谋划综合治理

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环境保护和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必须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生物、工程、技术等多种措施协同发力，努力形成生态环境工作的整体效应。

更加注重治理的系统性。紧紧围绕生态环境的构成特点，按照目标一致、规划衔接、资金集中、措施同步的思路，坚持山水林田湖一体化治理，增强环保、国土、林业、水利、农业、城乡建设、产业发展等相关规划的协同性。尤其要从人口布局、产业发展、城镇建设等更高层面的大系统出发，及时发现解决各专项规划的局限，并抑制可能在全局中产生的负面效应。以陕西为例，针对陕北水土流失严重的情况，要综合运用退耕还林、小流域治理、治沟造地、建设淤地坝、防沙绿化等多种措施进行治理，努力实现治山、治水、治地、治林协调推进。在治理渭河时应着眼于保护黄河这个大目标，加强与关中城镇群和产业发展规划的有机衔接，统筹实施支流治污、蓄滞洪区建设、水库建设和沿线景观带建设。在陕南保护汉丹江水源地中，应充分考虑秦巴山区的地质结构和群众生活状况，把避灾和生态搬迁、扶贫开发、保障性住房建设、小城镇建设以及发展绿色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形成生态保护与群众致富良性循环的大格局。

更加注重技术的综合性。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原因具有复杂性、特殊性的特点，用单一学科、单一技术和单一方法难以实现系统有效的治理，必须在继续加大生态环保技术创新力度的同时，高度重视推进相关技术的关联与融合，协同开展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带动节能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环保产业加快发展。在节能降耗方面，加快推进重大装备制造核心技术、关键节能技术和清洁生产等技术的集成应用，努力使工业产品单位能耗指标和排放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治水方面，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实现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的“五水共治”。在城市大气污染防治中，既要突破城市群大气污染控制、非常规污染物控制、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关键技术，又要加快推进绿化造林育种、种植、养护等方面的技术攻关，多种技术手段并举减少污染排放、增加碳汇总量。

更加注重环境的自愈性。生态环境具有自我恢复、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自我发展的功能。比如，陕西通过25年的封山禁牧和退耕还林，使绿色成为陕北高原的主色调，而且气候明显改善，年增降雨量100毫米。自1981年洋县发现7只野生朱鹮以来，我们采取划定保护区、禁止周边使用化肥、建立信息员制度等措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朱鹮种群数量发展到2000余只，活动面积也由最初的20平方公里扩大到1.3万平方公里。实践证明，在有效控制人为损害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利用自然系统的自愈机制走向生态平衡。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总书记“让透支的资源环境逐步休养生息”的要求，统筹推进严格保护与主动保育，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一方面，继续实施生态搬迁、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重点工程，在城乡建设中强制性划定绿地范围，给自然生态留下必要的人文关怀和时间空间。另一方面，加快建设“百万亩森林”“百万亩湿地”，系统规划建设关中水系，以重现“八水绕长安”的美景，促进生态系统尽快恢复生机与活力。

用系统化思维推进环境保护工作必须通过改革破解难题

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我们要按照这一要求，加快建立健全完整、规范、稳定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系统化做好生态环保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健全政绩考核导向机制，坚决纠正唯GDP的片面政绩观。坚守耕地红线和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四条红线”，绝不越雷池一步。创新干部考核制度，对生态脆弱和重点保护地区探索取消GDP考核指标，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加快建立更加注重发展方式转变、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绩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特别要防止一味以生产总值排名比高低、论英雄，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把保护生态、改善环境和充分就业作为加快发展的基本前提，用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支撑更高水平的经济社会发展。陕西从今年改革了考核机制，将环保工作的考核权重增加了一倍，以引导各市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创新环境监督管理体制，切实增强治理工作的协调性。大气、河流、地下水的污染没有行政区划界限，必须加快构建跨行业跨部门跨行政区划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工作机制。陕西在渭河污染治理中，不仅建立了沿渭各市的联防联控机制，而且主动与上游的甘肃省共同建立了渭河流域环境保护城市联盟，初步实现了跨省同治。下一步，我们将把这一做法推广到大气、地下水和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等更多领域，完善联席会商、信息共享、生态补偿、项目联报及跨界环境事故协商处置等多项机制，同时整合各类力量健全统一监管、分工负责的监管体系，积极推进执法机制创新，不断提升环境监管和治理的综合效益。

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尽快改变资源价格和环境违法成本过低的问题。主要是建立健全能够反映环境成本和修复效益的资源定价机制，积极构建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生态补偿和损害赔偿的制度体系，有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主动减排的积极性。同时，加快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造成后果严重的行为依法追究责任。陕西作为能源大省，将在这方面大胆探索，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尽快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